

中国扶贫：破解人类共同挑战的“金钥匙”

新华社记者康逸、谢鹏、许嘉桐

五年来，中国减少贫困人口6800多万！这相当于每年脱贫1000多万人，每月脱贫100多万人，每天脱贫3万多人。

一年前，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一年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庄严发出共同努力消除贫困的强烈呼声。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银行行长金铺如此评说中国的脱贫成绩。创新脱贫方式——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视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

向全球输送脱贫红利的发动机

在不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人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连饮用水等最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保障。绝对贫困就像锁喉魔爪。

在发达的美国，0.1%最富裕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财富的总和。相对贫困犹如压顶的铅云。

贫困，一个古老的字眼，在今天不仅依然发生在欠发达国家，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发达国家，阻碍着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之一。

30多年来，按世行标准，中国减少贫困人口7亿多，比美俄日德四国人口总和还多，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如

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脱贫成就。”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印度专家库尔卡尼由衷赞叹，“这不仅使中国受益，也使全人类受益。”

“中国扶贫不仅是要让人民摆脱贫困，更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眼中，脱贫的中国民众是消费市场的新兴力量。

“脱贫后逐渐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国人，正成为其他国家产品的重要消费者，他们的需求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如此诠释中国脱贫给世界带来的重大利好。

托起世界脱贫事业的中国力

5月的一个清晨，缅甸首都内比都一座淡黄色小楼前突然喧闹起来，中国扶贫专家与缅甸人员热情拥抱、握手。这不知是第多少次双方约定同去考察中国援缅减贫示范合作项目了。眼下项目组正在跟天气赛跑，争取在雨季来临前把水井打好。

“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在中国描画的反贫困斗争时代画卷中从未错过国际合作。

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伙伴关系，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中国广泛利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多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合作，帮助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更

快消除贫困创造重要条件。“一带一路”驱动的投资将让数千万人甚至数亿人脱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说，这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力所能及地向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扶贫援助。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7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破解人类共同难题的金钥匙

“没有窗，又黑又闷，住在里面也觉得悲观。”34岁的坦桑尼亚农民库尔瓦·阿卜杜拉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样的茅草屋里。如今，他不仅第一次住进了砖房，还从村里的贫困户变成了示范户。“现在我有许多规划，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一切要靠把希望播撒到非洲田野上的中国农业专家。今年，中国农业大学继续保持与坦桑尼亚政府的密切合作，让中国精准扶贫、特色扶贫的经验更广泛地惠及当地民众。

中国的脱贫方案和脱贫行动在让自身发展更加平衡协调、持续健康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更多启迪和借鉴。“精准滴灌”“不能手榴弹炸跳蚤”的精准脱贫政策让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尼·林斯在内的中国问题专家赞赏不已。“中国减贫措施针对性强，找准了贫困的根源，”他说，“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教育等措施保证贫困不再反复，为不少国家提供了启示。”

从“输血”到“造血”，扶贫更扶志。中国扶贫不是简单地发放福利，而是带领贫困人民一起拼搏，燃起雄心，追求梦想。这令出身农家的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体会颇深。

“扶贫不仅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来自扶贫对象自身努力，”杜进森说，“与缺少可持续性的输血式扶贫相比，中国帮助扶贫对象自力更生的造血式扶贫更值得提倡。”

中国多年的扶贫实践一再证明脱贫首先要摆脱“意识贫困”、“思路贫困”。中国智慧和方案不仅适用于拓展南南合作，也对参与全球减贫的发达国家有很多启发，为南北合作提供新的模式。盖茨基金会已与中开展合作多年，帮助贫困的非洲国家。基金会主席比尔·盖茨说：“中国政府很有想象力，其魄力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摆脱贫困》英文版电子书上线，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有机会从中觅得中国破解贫困这一人类共同挑战的“金钥匙”。作为这本书的忠实读者，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米十分真诚地说：“这本书对如何减贫非常有启发性，我推荐各国扶贫官员都来看看。”

亿万千百万，皆起于一。和许多将中国脱贫经验付诸实践的国家一样，缅甸热切期盼着减贫项目结出更多硕果。缅甸农业、畜牧业和水利部部长昂杜充满信心地说：“贫穷是不稳定根源，也是国家发展的障碍。我们坚信，中国在减贫方面的良好实践和宝贵经验必将在缅甸成功复制。”（参与记者：庄北宁、李斯博、张兴军、张启楠）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邻家有花开正好

中国改革开放的欧亚故事

新华社莫斯科6月24日电（记者栾海）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在63岁的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泽连科夫眼中，是一段活生生的国家跨越式发展史。

这位曾经的苏联驻华外交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多是平房”，很多人“冬天用煤炉子取暖”，“街道就是自行车的海洋”，“最不可思议是，在中国，自行车原来可以做很多事，例如搬运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

泽连科夫前些年又造访了中国。他描述，北京已是“世界级大都市”，冬天“采用清洁能源集中供暖”，“街道上汽车川流不息”，“最让他兴奋的是，”“从北京坐高铁只消半个小时，就能到天津吃狗不理包子了”。

从童年记忆到学术解剖

泽连科夫对“煤炉”“自行车”“狗不理”印象深刻，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对改革开放的描述则温婉而充满画意：“改革开放的中国，好似一朵美丽鲜花，瓣瓣绽放。”

扎哈罗娃的父亲是苏联外交官。上世纪80年代初，扎哈罗娃随父母第一次来到中国。彼时的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她回忆说，那时北京街道上的人们大多穿着绿色或蓝色上衣，剧院和博物馆也不是很多，妈妈经常带着她去北海公园和宋庆龄故居。

而到了90年代扎哈罗娃一家人第二次来到北京时，“我发现人们更爱笑了，不仅穿着更加时髦，还积极学习外语，喜欢和外国人交流”。“在北京的生活，为我打开了感知中国的大门。”扎哈罗娃说。如今，作为外交官的她仍然会经常出差到中国，见证中俄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对我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术语，更是儿时的回忆和感受。”扎哈罗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泽连科夫和扎哈罗娃用直观感受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则从学术角度向记者列举了一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时代关键词：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有着坚定的政治意志，无惧改革困难。”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中国政府敢于通过试点，验证改革效果，总结经验教训，择优实施推广，从而快速增强国家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居民生活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守望相助到分享红利

40年改革开放，40年合作发展。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人员交流到技术分享，在中国和俄罗斯这对对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近邻之间，不断涌现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

1994年10月，时年63岁的俄罗斯应用化学科学中心总工程师西特里维应邀带领专家组来到中国，在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担任技术指导。扎根中国24年，如今的西特里维已是白发苍苍。在他的指导下，巨化集团的各类氟化工产品工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蜕变，完全实现了产品替代进口、破除外国垄断的目标。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西特里维说，“通过巨化这个缩影，让我看到浙江，甚至整个中国，在它美丽富庶的身后是千千万万的人民、众多企业在奋斗拼搏。”

西特里维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提升生产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许多赴华外国专家中的一员。而今天，中国与世界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当年的“学徒”开始用新技术装扮“师傅”的家园。

上世纪50年代，一批苏联专家参与了北京地铁的规划设计。如今，中国企业带着全球领先的地铁技术前往俄罗斯，在莫斯科地铁改造扩建工程中承担隧道盾构掘进和车站主体建设。项目总工程师瓦季姆评价：“中国设备十分先进。俄中双方的工程师协商解决，就像兄弟一样。”

从授人以渔到提速飞奔

如果说改革开放拉动了中国与欧亚地区合作的列车，那么，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成为这趟列车提速飞奔的新动能。

棉花种植业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农业支柱产业。

2014年，中国中泰集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启动了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项目，在当地打造现代化棉花产业基地。短短3年时间，产业园从图纸变成现实，逐渐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产业链。

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自2003年起在当地推广棉花种植技术。作为第一批采用中国棉花技术的吉尔吉斯斯坦棉农，努尔迪诺夫告诉记者，采用中国技术之后，棉花的产量从每公顷3吨增长到了5吨，他的种棉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棉花种植、纺织、基建、铁路等领域，中国企业大力推动本地化，加强对当地员工的技术培训，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将中国技术、投资转化为各国的生产力，为丝路沿线各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

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阿姆列巴耶夫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商人到哈萨克斯坦投资兴业，促进了经济转型，提升了经济质量，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哈方希望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过境运输，推动商品出口，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

（参与记者：赵嫣、周良、魏忠杰、魏董华）

“尬厕”调查：没墙、没顶，只有个蹲便器

新华社太原6月23日电（记者魏颀）“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厕所革命”让群众用上了卫生的厕所，成为最贴心的精准扶贫。当前，我国进入脱贫攻坚关键阶段，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坚决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对新农村建设的标志意义。

但记者调查发现，中央高度重视并不断出台相关方案及措施的农村改厕，在一些地方却“变了味儿”，出现了半吊子的“尬厕”——没墙、没顶，只有个蹲便器。

20来户人家却有八九十个用不上的蹲坑

房前屋后、乡间路边、山坡沟里……没有围墙、没有顶棚、裸露在外的蹲便器随处可见。若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山西娄烦县2016年一些农村改厕后的厕所。

娄烦县是太原下辖县，地处吕梁山腹地。位于大山深处的凤凰村，交通极其不便，遇上雨雪天气，村子几乎与世隔绝。记者从县城驱车，行驶了约半小时的山路来到了这里。刚进村，在路边就看见了只安装了白瓷蹲便器，没有围墙和顶棚的“厕所”。

“村里到处都是蹲坑，没有一个能用。”70岁村民强俊说，凤凰村全村93户，常年住在村里的也就20来户人家，却有八九十个用不上的蹲坑。走在凤凰村，记者看到，有的村民家门口两边就有三四个蹲坑，村里道路边上也分布着蹲坑，还有的被安在了山坡和沟里。

不仅仅是凤凰村，我家村、四家坪村、三元村等村也存在不少只安装了蹲坑的厕所。一些村民不解，为啥改个厕所却建成了人均一个蹲便器的半吊子工程？娄烦县卫计局一位负责人说，改厕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各出1000元，建好一个厕所不到3000元，市级财政能保证，但



▲山西娄烦县凤凰村村民用手拽出了家门口的蹲便器（3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魏颀摄

县级财力捉襟见肘，所以厕所只建成了地面部分，围墙和顶子需要村民自己负担。再加上当时没有把政策宣传好，很多村民误以为为改厕就应该由政府全部负担。但一位村支书说，盖那么多不能用的厕所，就是浪费钱，还不如集中财力建几个能用的。对于娄烦县一些村子改建的厕所很多分布在荒废的屋子前、道路边的现象，山西省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这是“瞎胡来”，确实不合适。

拆旧未建新，如厕“打游击”

经过2016年的改厕，距离凤凰村不远的我家村，一些村民却因为拆旧未建新，沦为无厕所可上的地步。

我家村常住人口30多人，新建了约40多个“厕所”。这个村村民告诉记者，听说政府对建农村厕所扶持不少，每家每户都要修建，所以很多村民都把自家旧厕所拆掉，准备建新厕所。

“旧厕所拆了，新厕所也没建好。如今，大小便东躲西藏打游击。”56岁的村民王爱民和记者谈及如厕问题时就面露难色。他说，自从拆掉旱厕，一年半时间，他只能到屋后、山坡和沟里偷偷地解决大小便。

53岁的村民强玉贵家一面院墙上，有一处约4米长、裸露在外的砖墙。据强玉贵说，这是他家旧厕所的一面墙，旧厕所被拆掉后，新厕所仅仅是一块开裂的水泥踏板和一个蹲坑。强玉贵告诉记者，他找过村委会询问啥时

候能把厕所修好，村干部总说要修，但是一直没有下文。

最迫切的希望是踏踏实实地

上个厕所

凤凰村82岁的方维娥家改厕后的厕所，是村里唯一一家没有损毁、塌陷的厕所。但是她说，看到村子很多厕所塌陷后，即便现在围上围墙，搭上顶棚，她也不敢用了。村民说，蹲坑下是两三尺深的坑，雨水越积越深，去年还曾淹死过小羊羔。村民害怕出人命，现在已将便池掩埋、遮挡。

还有的村民觉得不好看，有条件的自己完成了改厕的“后续工程”。紧挨县城的三元村村民段爱娥说，一进院子就看到个孤零零的蹲坑确实不好看，就用自家盖房剩下的砖头把蹲坑围了起来。“这样好实用。但没有搭顶棚，遇上下雨天上厕所非常不方便。”段爱娥说。在我家村，一位村民将水泥踏板抹灰加厚，重新固定蹲便器，找来不用了的石棉瓦当围墙，建成了一个非常简陋的厕所。

娄烦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深山的凤凰村、我家村等村庄土地贫瘠，留守的村民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65岁的三元村村民李旭说，他家收入主要靠种地，1年平均收入不到3000元，雇人把厕所建好，费用约1000元，这笔钱对他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记者调查发现，近几年，娄烦县不断加大改厕力度，不少农村厕所大有改观。不过，对于那些改厕未完成村的村民来说，目前他们最迫切的希望是政府能把改厕工作做扎实，不要为了完成数量而忽视了质量，让他们踏踏实实地上个厕所。

厨师职业的细分。中式烹调师、西式烹调师、公共营养师、营养配餐员等职业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脱胎于理发匠的美容美发等职业也在城市服务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兽医专业为基础分化出来的宠物医师，也颇受市场欢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技术水平的革新，我国制造业主要工种由传统的车工、铣工、刨插工、磨工、钳工向数控领域再到向机器人应用领域转变，生产制造的精度和效率有了极大提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在职业领域，就是传统的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呈现越来越细化发展的趋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袁良栋说。

“2015版职业大典中新增了347个职业的描述信息。”葛恒双说，这有利于让更多从传统职业中分化出来的职业被大众所认同。

新科技催生新职业

今年41岁的辛建英是江西省余江县平定乡洪万村人，除了会做一般的农活外，她还会开“飞机”——通过遥控植保无人机，进行喷洒作业。

消失、细化、新生，细数40年职业变迁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叶昊鸣、齐中照、袁慧晶）铁路扳道工、弹棉花手艺人……这些职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陌生；“无人机飞手”、程序员……40年前未曾预料到的职业如今却在走红。改革开放40年，改变的不仅是经济体量，也改变着社会分工。

40年来，“工、农、兵、学、商”为主的单一职业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职业体系在细化与新生中重生。而每一个个体，也在调整适应时代变局中，感受起伏人生。

昔日热门职业逐渐消失

安贵涛今年55岁，曾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西车务段门头沟站做了35年扳道工。他的工作主要是根据车站值班员的指示，正确及时地扳动道岔，确保火车能够顺利进站。

这是个体力活，责任却重于泰山。门头沟站附近曾有8家煤矿，每天运煤的火车络绎不绝。在安贵涛的印象中，一天最忙时需要扳动200多次道岔，有时连午饭也来不及吃。

伴随生产技术与工艺的革新，铁路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动道岔，像安贵涛这样的扳道员日渐减少。

与扳道工境遇相似的，还有修钢笔工、补锅

匠、寻呼转接员等一批曾经耳熟能详的职业。

201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减少了205个职业。

“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少过去热门的职业由于不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处于即将被淘汰的境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标准处处长葛恒双说。

北京大学职业研究所副所长陈李翔认为，这种逐渐“消失”的过程，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一种替代，有利于促进职业的结构转型。

需求升级推动传统职业细分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厨师就是做饭炒菜。但随着人们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厨师也开始细化，产生了像我这样的烘焙师。”蔡叶昭说。

今年23岁的蔡叶昭是安徽省芜湖市人，虽然年轻，却已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金牌获得者，现在从事烘焙教练工作。

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物质文化需求日趋多样。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吃饱，更要吃得精细，吃得营养，这一变化导致了